



西安地方志

2013·第5期

(总第224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我们的村落

皇甫庄村 (3)

旅馆村 (4)

金花落村 (6)

历代名人与西安

鉴真——打开中日交流之门的“大僧都”
..... (7)

学术交流

浅谈地方志影视版的制作 张世民(9)

人物春秋

直言敢谏的严挺之 (14)

史料钩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6)

日本记住原子弹,忘掉了“九一八” (18)

开国大典城楼上为何少了五元帅 (21)

斩贪官诛污吏——铁腕反腐朱元璋 (22)

中国当年是否应该出兵抗美援朝? (24)

中国历史上的四个咸宁县 (30)

冯玉祥三到韩森寨 (32)

西安风情

西安城门趣闻(二)——永宁门 (34)

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35)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大白杨社火芯子 富小云(整理) (36)

文史拾趣

古代的“开学典礼” (37)

太学和国子监是古代的大学吗 (38)

重阳节有什么习俗	(39)
雍正:让贪官后代做穷人	(41)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概念的 认识和使用	(43)
志鉴动态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认真筹备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	(46)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全面聚焦新党章 认真 学习强意识	(46)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征求意见听实情 解决 问题促发展	(47)
临潼区召开区志编纂工作座谈讨论会	(48)
知识窗	
秋季为何称作“金秋”	(49)
古人是怎么“管”法官的?	(49)
“中国”名称的由来	(50)
西安作为都会城市最早的两个称谓是“丰” 和“镐”	(51)
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和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	(52)
“男左女右”的说法从何而来?	(53)
抗战胜利纪念日为什么定在9月3日?	(54)
历代诗人咏长安	
《卜算子·咏梅》..... (南宋)陆 游	(55)
解字	
“友”	(31)
“双”	(52)
名句欣赏	
【君子以果行育德】等五句	(15)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 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 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市政府

大院26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改造前的皇甫庄村

位于西安市兴庆南路。姓氏共6个,分别为魏、郭、孙、张、白、繆。村民关系比较融洽,家族矛盾几乎没有,村风淳朴。

据西安交大考古发掘,皇甫庄这片神奇的土地,深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西汉壁画墓的发掘,隋唐古建筑的遗迹,白居易东亭的惊现、虾蟆陵故址的考订、百十珍贵文物的出土,几多历史人物的留踪等等。

皇甫庄及周边1000余亩土地,前址于汉代则是有名的皇家园林——上林苑,里面畜养着珍禽怪兽、奇花异草,点缀着许多瑶石美

玉、绿地锦波,并且宫阙鳞次、亭阁相望、龙舟泛浮、棹女讴歌,真可谓“殫土木动,究造形之巧”。这里曾驰骋过汉武帝的宝马雕车,这里曾经给了司马相如无尽的灵思。

历史上北沙坡、皇甫庄一带曾是皇亲国戚的豪华庄园。唐代的皇甫庄北边曾是兴庆宫,这一带曾聚住着众多的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明嘉庆年间,由于分社被分为南北沙坡和皇甫庄三个村子,此划分一直延续。

皇甫庄早期叫“河洋府庄”。解放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皇甫庄东创办了民敬小

皇甫庄村

●我们的村落●

学,当时在民敬小学的后门内有一碑匾,写着“河洋府庄”。后来皇甫庄村民在浇地时发现一墓碑,碑上刻有用朱砂描写的“河洋府庄”,后因方言谐音为“皇甫庄”,“社教”时,由于破四旧忌“黄”字,经村委会商议改为“皇甫庄”一直沿用。

1955年,西安交通大学选址迁入时,选中了皇甫庄周边,还有别的企业也选中此地。当时的村委会出于净化村子周围环境及能够使后代增长学识,无偿奉献200余亩地为交大建校。此后周边陆续被西安交通大学征用。

2006年7月1日政府下发文件,将碑林区农村全部转为居民。2008年10月15日农工局领导来到小区召开现场会,举行了隆重的撤村建居挂牌仪式,宣布撤销皇甫庄建制,成立兴庆南路社区居委会。农转非后,按照政

改造后的皇甫庄村



府要求,进行了清产核资,将集体资产全面造册登记,张榜公布,为实行股份制经济打好基础,2009年11月城中村改造拆除了旧村。原村址上开始了安置楼和商业开发建设,2010年1月16日封顶的安置楼叫“常春藤花园”。

每年农历六月初四为皇甫庄忙罢会,农忙结束后,亲戚朋友们相聚在一起谈论各家收成情况,庆贺丰收。



改造前的旅馆村

旅馆村

旅馆村即原来的李家村第三生产队。

据老人讲,解放初期,和平门外雁塔路周边基本都是李家村的土地,随着国家建设需要,到了1957年集体大部分土地被征用。1958年,大队召开各分队会议协商后,在曲江购买了260亩土地(省打靶场东侧),按人口比例,该队分得100亩,之后20多年时间一直在这

块土地上耕种(主要以小麦、玉米为主),为了增产粮食,1966年曾在此进行平整土地大会战。

1978年底,西安煤炭研究所(现煤炭总院西安分院)经政府批准征用了全体村民的住宅庄基地(现西安分院和西安话剧院南边至铁一局围墙为界)。1979年至1980年上半年

在秦岭菜地上给各家各户盖起了简易二层楼房,秋季村民陆续搬进新居(现建设西路新旅城位置)。所谓秦岭菜地,老人都这么叫,搬到新居后叫李家新村。1983年,煤研所给村子盖了一栋5层楼房(现雁北路东边区商委内),集体开办了古城旅社,三年后被区商委买断。失去土地的村民很发愁,剩余土地收益甚微。1984年,整天无事可做的村民认为煤研所白白地征用土地,为了生活,开始集体上访。在村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生计,村民崔伯印、董瑞禄、李有庆三家率先在自家院落办起家庭旅馆。此举得到政府鼓励,由农副局牵头,简化审批手续办理营业执照,村中家庭旅馆迅速发展到七八十家,1985年6月经区政府同意更名为旅馆村。旅馆多了,客源是个问题。村民杨德华看到旅游商机,在村里办起第一家“东线一日游”(临潼、华清池、兵马俑、秦始皇陵)。随着客源不断增多,村委会成立古城旅行社,购买大客车,成立旅游车队,最旺时发展到9辆轿车专搞旅游。

1987年,为了使曲江土地不再撂荒,将土地廉价出租给别人,种植花草苗木。1999年曲江土地已有开发,村民们看到了曲江土地的生机和希望。2001年,长江置业开发公司(现曲江南苑)找村上商谈换地事宜。由于土地是“插花”地(东西南北都有土地不集中),为此,村班子召开相关会议讨论,在维护集体利益的前提下,经双方协商将本村绝大部分土地换到了路北(现雁鸣小区西半部分),同年经测绘部门测量在雁塔区土地局办理了土地证。

随着曲江的快速发展,村民们视100亩土地为“宝地”。2004年,村班子开会研

究,为了防止土地出现问题,主动“出击”开始寻找局里、区政府、区域改办、市城改办及市、区多层管理部门,达到在村土地上筹建新村的目。2005年与曲江管委会达成了征地协议,返还30亩国有划拨土地筹建新村。2006年7月1日政府下发文件,将碑林区农村全部转为居民。2008年曲江新村建成,起名芙蓉小区,村民已全部搬进小区。

2008年10月15日农工局领导来到小区召开现场会,举行了隆重的撤村建居挂牌仪式,宣布撤销旅馆村建制,成立林雁社区居委会。2009年11月城中村改造拆除了旧村。

解放初期,李家村人春节前有糊灯的传统,糊灯手艺绝不在三兆村之下,入冬开始准备,买糜子、搓捻子、绑架子、蜡纸等工续一样不能少,最后一道工序糊灯成形。腊月廿八开始进入东木头市花灯市场卖灯。当年的灯市,从年跟儿开始,买灯、看灯、逛灯会的人群络绎不绝,直到过了正月十五灯会才逐渐散去。有句儿歌: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娃娃睡,娃把灯笼烧着咧,他舅把钱白花了。舅舅给外甥送灯的传统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农闲时节,自乐班、锣鼓队、耍狮子龙灯、踩高跷、耍社火是李家村人的传统。每逢春节,社火队都要给乡邻村庄、单位拜年。



改造后的旅馆村



金花落村改造前村貌

金花落村

位于互助路立交桥东北角,紧邻东二环,是西安市商业旅游的黄金地段。有着百年历史。

听老人讲,慈禧太后的马车路过此地,头上金花钗掉落,因此这里就叫金花落。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对农村进行合作化建设,成立了合作社。20世纪70年末,全村208户,506人,男256人,女250人,主要依靠土地生存。20世纪80年代初,市政府拓宽东二环,安置沿街的一些村民,转入城镇户口,收回土地。按政策安置了一部分村民参加工作,年龄大或其他原因未安置者给予补助。由于村子位于东二环沿街,村民先后筹建房屋,不断翻建老宅,大多数家里开设招待所、食堂,

收入逐步增加,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2009年10月初,金花落全体村民响应政府号召,积极配合政府进行集体拆迁,农业户口转入居民户口时间经过20余年结束。



改造后的金花落村

鉴真

打开中日交流之门的“大僧都”



鉴真（公元688—公元763年），原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14岁时被智满收为沙弥，配居扬州大云寺。神龙元年（公元705），依道岸律师受菩

萨戒。景龙元年（公元707），出游洛阳和长安。公元708年，在长安实际寺（唐代寺庙名称，位于唐长安城太平坊西南隅，即今西北大学老校区校园内图书馆一带），从弘景法师受具足戒，前后三年多，遂返扬州。

这短短的三年多，对鉴真的影响极大。弘景生于公元633年，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出家，后随文纲学习律法，并至荆州玉泉寺学习智者禅师的止观法门，著有《顺了义论》二卷，《摄正法论》七卷，《佛性论》二卷。所谓名师出高徒，其间鉴真的学业突飞猛进。特别是在长安的数年间，正值中宗、韦后大力推崇佛教，内道场佛事，包括中宗及眷属的授戒与法门寺佛骨的供养和奉送，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在大兴善寺逗留数月，拜阅和抄写了大量印度三大师主译的经卷。鉴真到大荐福寺，又拜读到中国高僧翻译的大量经卷。

当时长安不仅高僧荟萃，而且名医云集。

在鉴真拜访的高僧中，精医术的不乏其人，他总是虚心求教。皇宫的太医署聚有不少医林高手，再世华佗。他先从弘景法师学习五明医学药典，被誉为神药的奇效丸，就是弘景传给他的。弘景是宫廷传戒大师，由他引荐，鉴真又从御医身上学到不少秘传医方，治病绝招。回到扬州后，大力弘扬律法，而且最终将律学远播东洋。

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当时日本社会矛盾较多，统治者于是想利用宗教进行化解。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想法。最终也造就了鉴真六次东渡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日本聘请唐朝戒师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要求高，所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很难。甚至于找到过一人，后因各方面原因返回唐朝。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为了宏法传道），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鉴真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

从公元 724 年开始，先后 6 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公元 754 年，66 岁时到达日本。宗教信仰的内在动力在其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公元 756 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公元 758 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他。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于是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公元 759 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搬进居住，从此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其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后由思托撰成了《鉴真和尚东征传》。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公元 763），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次年，日本遣使往扬州诸寺通报鉴真去世的消息，扬州所有寺院携偕众身穿丧服，面东三日，以志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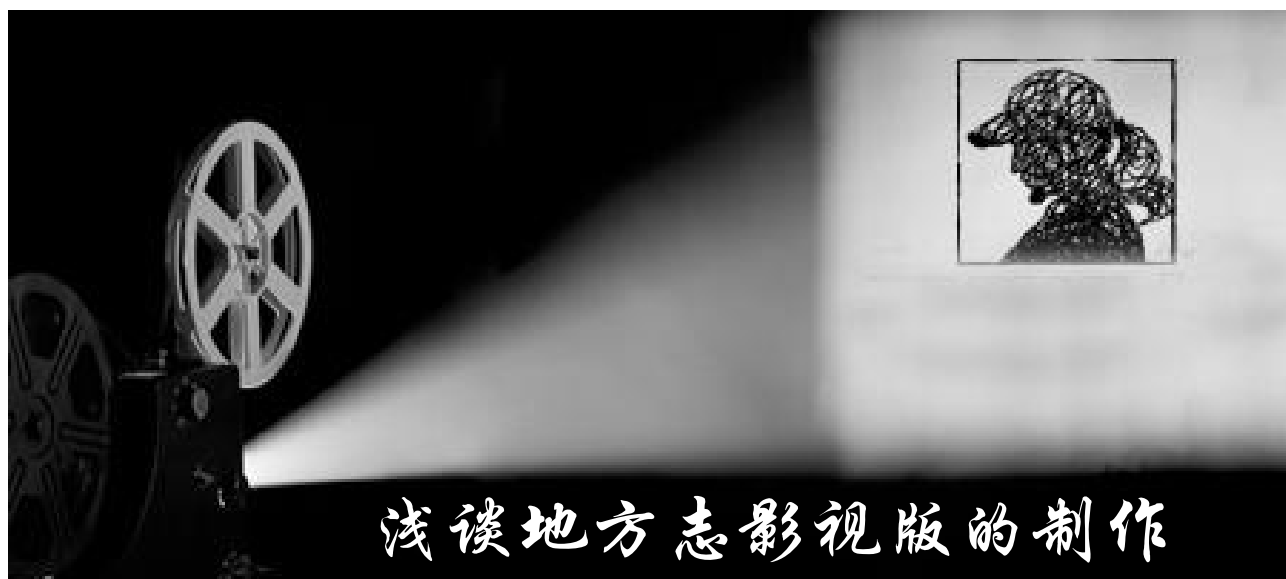
鉴真留居日本 11 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带去了大量书籍文

物。同去的人，有懂艺术的，有懂医学的，也把他所学用于日本。鉴真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样式，为日本精心设计了唐招提寺的方案。经过两年，唐招提寺建成了。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这座以唐代结构佛殿为蓝本建造的寺庙是世界佛教建筑的一颗明珠，保存至今。

鉴真熟识医方，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又大力传播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 50 卷。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由于鉴真对日本的杰出贡献，日本曾授予他“大僧都”、“大和上”封号，日本人民称鉴真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等，充分表达了日本人民对鉴真崇敬、膜拜的感情。

如今，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鉴真佛教学院已经建成招生，该学院由江苏省佛教协会主办，是国家宗教局批准设立的全国性宗教本科院校，由此不难看出鉴真的深远影响力。



浅谈地方志影视版的制作

◎ 张世民

近年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思路开阔，新举频出，工作搞得相当活泼。2013年初，又进一步提出了影视版《西安市志·戏曲志》的制作构想，拟将西安民俗、西安方言和西安戏曲作为影视版的核心内容，这个文化创意现实意义重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尤其是将民俗、方言和戏曲等特色纳入其中，富有社会参与、社会互动的特点，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也最能反映一个区域的物质、非物质文化生活情态，从而产生现实的感召力和生命的撼动性，这一制作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所谓“志”，就是记录的意思。所谓地方志，其实也就是对特定地方情况的全面记录。地方志属于平面的、一维的传统载体，而影视版属于动感的、二维的现代媒介，后者的可视性和感染力历来是令人瞩目、令人关注的。采用影视版的方式来记载地方志中所要记载的特色内容，并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密切互动，既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创意，更是对平面文化载

体的一种延伸、补充和深化，其历史的记录价值和艺术的审视价值也都不可低估。

作为地方志著述的一种，影视版志书应该葆有相对独立的记录视角；作为电视纪录片，应该具有完形的、典型的记录功能。两者所关注、所记录的，恐怕不光是书面文献、舞台造型，而是包括了区域人群的一切社会活动，那些与戏曲舞台密切互动的现实生活也在其中。现实生活中的戏曲艺术，要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相协拍，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相衔接，与众多的历史人物相关联。包括秦腔在内的戏曲艺术尚未灭绝，但已基本丧失了当代社会的主流艺术地位。秦腔演出也曾走出海外，但走向海外的艺术形式，同样缺失了文化精髓，遗弃了人文内涵，其艺术碎片化的特点相当浓郁。

为了进一步明晰影视版志书的著述特点，规范其拍摄内容，提升其摄录水平，我们有必要将戏曲志影视版的制作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加以重视。在此，有几点不成熟的



看法:

一是写本体还是写外在?在影视版志书的制作过程中,单纯拍摄历史故事、历史文献是不够的。电视视角应该是现实的,具有新鲜的生活质感。戏剧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戏曲与生活的关联是不可分割的。有人问,为什么秦腔艺术产生于明末清初,而非更早的时期?汉唐以来的艺术造像文物,是否能够说明一定的渊源问题?理想化的戏剧艺术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什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会涌现诸多剧种?秦腔与眉户、弦板腔、碗碗腔等剧种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差异等等,这都是值得思考、值得关注的问题。戏曲志影视版的编写,也是无法回避上述问题的。

二是写现状还是写经典?流演在现实生活中的民间艺术常常是粗糙的,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剧目常常是精致的。但是历史上的

精粗之别有时也可以置换。我们既要反映存在于戏曲舞台上的精英作品,更要反映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艺术。譬如易俗社,原来流播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对文盲、半文盲社会的文化启蒙和精神救赎产生过重要的警醒作用,耳热目酸,振聋发聩。现在则似乎变成了一种准贵族的、小众化的艺术场所,瑟缩于精品舞台的当代秦腔艺术基本丧失了与民众的对话能力。不少新编秦腔作品获奖之时,也是走向绝境之日。对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究竟应该怎样选择,怎样介绍,才能使之臻于较高的记录境界?

三是写整体还是写碎片?所谓整体的、首尾完贯的东西,常常需要大量的线索铺陈、过程铺叙和背景铺垫,很难写清楚、写深刻、写到位。采用时间较短的电视影像手段,或许更加困难。对此,我们有必要采取典型制作的手法,拿出若干精粹的艺术碎片,将这些精粹的艺术碎片扮靓,或许也是一种可以采用的介绍方式。对于精粹的艺术碎片的历史追溯,也可以通过历史文物来展示。尽管有声时代只有百年之久,但是有形时代却源远流长。比如参军戏等古代泥塑,也可以说明问题。

四是写生活还是写遗产?2005年10月,在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高层论坛上,我曾接触过来自台湾的文化学者。在一次秦腔哑剧表演后,我问台湾学者有何观感?一位台湾学者认为秦腔表演“不惜力”;另一位认为“质实胜于技巧”,并说朱熹《诗集传》有关秦人性格的描写,于此可见一斑。这也说明戏剧作品反映了秦人的社会生活,早已融入了秦人的精神情操和思想观念。可以肯定,秦腔表演作为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秦腔剧本作

为集体记忆遗产,以及戏楼、道具作为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可以书写的重要对象。文化遗产其实是一种历史的标本,在不同艺术流派中将会发挥不同的影响力。譬如走进陕西乾县的一片田野里,剧作家范紫东的墓碑便足以说明一定的问题。

五是写剧种还是人物?从艺术角度去写还是从剧种、剧目和题材反映的社会角度去写,其把握的角度和探讨的问题也有所差异。戏剧中人物角色的写法富有魅力,不管是旦角、生角或丑角,都有不同的审美价值。丑角的“审丑”,其实也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只是这种艺术的表现方式,是对生活中的滑稽进行艺术的夸张。至于剧种、剧目和剧本,属于剧作文献和表演人格的艺术统一。对历来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系统介绍,也是影视版志书制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是写分类还是写源流?用历史的视角和分类的视角是有所不同的。地方志的基本视角,首先应该是分类的视角。而有关秦腔艺术源流演变介绍,属于典型的历史视角,它只是文字版志书的一部分而已。就戏剧分类而言,可以是形式分类,也可以是角色分类,甚至是剧情分类和乐器分类等等。历来戏剧的源流篇、演艺篇、角色篇、舞台篇和道具篇等等,都可以逐个介绍。譬如台湾《汉声》杂志在介绍陕西旬邑县库淑兰大师的剪纸艺术时,便采取了分类切割和源流欣赏相结合的处理手法,这两种视角都是可取的。

七是写记忆还是写历史?记忆是民间的。将民间的记忆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是民族人类学的著录方式;但原生态的记忆作品仍然是民间的,不带有官方的社会意识形态。如

果要化作一种电视剧,变成供人们欣赏和批判的艺术作品,则需要有官方的历史眼光。官方的历史眼光必然带有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

地方志的志体有多种形式,关键是如何照应现实生活,记录当前动态。地方志著述,理应具备各种不同的视角,各种不同视角之间相互为用,才能有助于影视版志书的制作。例如:

(一)地理的视角。也就是行政区划切割的视角。在介绍本区域的各种戏曲艺术之前,首先要透视一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戏曲是人群的艺术,脱离了欣赏人群的戏曲,必将丧失其隽永的艺术生命力。过去农耕环境下的戏剧艺术,与当代都市环境下的戏剧艺术相比,两者的艺术诉求有着巨大的差异。将某个时代的戏曲艺术还原于特定的区域生活,在反映戏剧作品的同时透视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群聚集的特点,反映其民族构成、文化构成、职业构成等等,就是非常必要的。戏曲艺术所适应的社会环境,虽然不以战争与和平相比较量,但却会切入最深邃的社会生活,对其内在动因和外在环境都应该重视起来。

(二)历史的视角。前苏联艺术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艺术论》中探讨了人类艺术的起源问题。对于秦腔、弦板腔、眉户剧、碗碗腔等剧种来说,秦人的水土、风情与文化是它的本质所在,除了渊源介绍之外,还要介绍班社、演员、剧目、剧场等基本元素。历史上戏剧的起源,可以借鉴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的研究视角。这个研究视角,不限于单一的线索,而是具有强烈的复合特点。我们对艺术起源

●学术交流●

的探索,目的不在于挖掘历史资讯,而在于展现现实生活。

(三)艺术的视角。与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相比,戏曲艺术有其自身的表演规律。这种表演艺术及其规律也可以适当点缀。当代人文学者吴宓曾说:文学是人生的精髓。其中,哲学是气化的人生(气体:汽),诗是蒸馏(液化)的人生(液体:水),小说是固化的人生(固体:冰)。以上均从各种含水的物质中得来。惟独戏剧,被他认为是爆炸的人生。(引文见吴宓:《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显而易见,与戏剧作品的情节矛盾和爆炸人生相比,哲学、诗歌和小说等等,其实都缺失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剧烈的矛盾冲突性。对于戏曲的爆炸性特征,加以科学记录应该是不可多得的。

(四)遗产的视角。凡是人类的文化遗产,都可能是行将灭绝的人类财富,但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又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人类集体记忆遗产等不同的存在形态。物质文化遗产所要保护的重点是文物,也就是带有人文痕迹的物化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对象的是人,也就是艺术的直接传承人。至于人类集体记忆遗产的保护,则重在原生态的文献。对不不同形态的文化遗产,吴宓必须超越现实的功利,寻找最恰当的记述角度。

作为地方志载体,应当集纳特定时期的社会共识,反映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地方志要体现社会共识,就不必排除学术争议,而要从学术争议中寻找真知。学术争议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引领研究的方向。问题在于,研究无禁区,而宣传有纪律。并非所有拍

摄出来的影像内容,都必须全部展示给当下的人们。当代记录的现实功利性太强,不利于人们的审美感知和全面认识;不少的内容留存后世,供后来的人们去研究、去思考,或许才是历史记录的最佳方式。历史上戏曲艺术的地位和作用,始终处于不断的消长、变化之中。就当前而言,戏剧时代早已过去了,甚至电影时代也都过去了,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代谢中。新的多媒体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穿透力,其反复咀嚼、多维重现的特点,为传统平面媒体和电影、电视等媒体所不可企及。举例来说。易俗社作为近代陕西影响力巨大的一个艺术社团,诞生初期深入民间社会,在移风易俗方面,为普通民众所热诚欢迎,但是现在出演机会很少,剧场布置日益精致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准贵族化的小众艺术,切断了与大众生活密切的联系脐带。易俗社的现实走向,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秦腔艺术的一种历史宿命。过去易俗社的剧种,大部分是历史剧作,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掌故,而在解放初期,从军政人员的视野里,剧作家范紫东似乎已被列入了“遗老遗少”的范畴。这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范紫东及其秦腔戏曲艺术创作的一种历史评价和现实观照。

秦腔艺术是西安诸多戏曲艺术中的一种。所谓西安,有历史的西安和现实的西安的区别,历史的西安属于大西安,而现实的西安受到政区的限制,其大都市的文化辐射力也就受到了政区的制约。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区域内的戏曲艺术,就不能放弃本区域与区域外的广泛联系。地方志要将人们写在大地上的社会活动作为记载对象,人们的艺术生

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也要反映出来,所以其社会现实感是不可忽视的。倘若仅仅限于戏曲文献,这种认识视界就要受到极大的制约,就很容易变成孤芳自赏的小众艺术。至于影视版中涉及的“专家”,既可以邀约戏曲研究家,又要包括民间鉴赏家,人民群众其实是最有发言权的受众人群。为了唤醒民众的视觉感受,我们既要调动人们的口述历史,又要从公共知识的角度予以点缀,予以批判。影像版志书可以采取人类学、民族学的原始记录方式,深入民间社会生活的深处,将包括自乐班在内的民间艺术生活生动反映出来,集中展示戏曲艺术在地方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影响,从而透现出当代人的时空观、价值观和交际观。原生态的现实记录,可能是最具直觉意义的人文记忆。有人说,宁肯将英伦三岛送人,也不能将莎士比亚送人,但是迄今为止,英伦三岛仍然是英国人的岛国,而莎士比亚早已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对于特定区域的戏曲志而言,同样也需要用这种文化观念进行记录和整理。

涉及影视版和文字版志书的关系,我认为两者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一定的差异。就共同的一面而言,两者都必须将现实生活纳入著录范畴,坚持自觉的文献记录意识,坚持原汁原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书写立场,同时要以凝聚了人类智慧的史志著述为旨归,符合地方志的志体规范。就差异的一面而言,文字版志书的知识内涵和信息容量丰富详实,叙述充分,尽管无法从声音上直接感知历史生活,从而产生视界的动感冲击力,但却可以反复阅读,永久保存,一版再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省出版过十卷本《戏剧

志》,诸如《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卷、咸阳卷、渭南卷等等,其中西安卷相当不错,其可读性也无可置疑。而影视版志书图像丰富,动感强烈,尽管无法取代文献文本,但却可以展现现实生活、反映历史真实,挖掘声频艺术,穿越视觉屏障,产生不可替代的生活感染力。陕西电视台“秦之声”、“百家碎戏”等电视节目,因互动性强,在民间社会影响极其深远。影视版志书作为一种多媒体的介质,完全可以葆有独立的著述形态,但却不能完全脱离文字版,也不能雷同于电视制作,不能进而采用虚拟、虚构和虚设等手段进行表现。《西安市志·戏曲志》影视版的制作,可以借鉴现有的历史文献,探索全新的致思途径,但又不必拘泥于此,唯文献之马首是瞻。影视版志书的制作,必须将大量的鲜活镜头投放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之中,必须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归集戏曲元素,提炼戏曲文化,用最富有艺术感知的艺术志形式,全面展现西安人民的历史性格和生存现状。



直言敢谏的严挺之

严挺之(生卒年不详),唐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名凌,字挺之,以字行。挺之少好学,举进士。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制举擢第,授义兴尉。遇姚崇为常州刺史,见其体质昂藏,雅有吏干,深器异之。及崇再入为中书令,引挺之为右拾遗。

睿宗好乐,听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

微臣窃惟陛下应天顺人,发号施令,躬亲大礼,昭布鸿泽,孜孜庶政,业业万几。盖以天下心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诚尧、舜、禹、汤之德教也。奈何亲御城门,以观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窃所未谕。

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釀为欢,无相夺伦,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昼,史册攸存,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乐。陛下还淳复古,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一不可也。谁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备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轻违动息,重门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跃马奔车,流言骇叫,一尘听览,有累宸衷。臣以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满堂不乐;一物失所,纳隍增虑。陛下北宫多暇,西墉暂临。青春日长,已积埃尘之



弊;紫微漏永,重穷歌舞之乐。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饥倦,以陛下近犹不恤,而况于远乎!圣情攸闻,岂不愾然只畏。臣以为三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礼频光,百姓颺颺,咸谓业盛配天,功垂旷代。今陛下恩似薄于众望,酺即过于往年。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吁嗟道路,贸易家产,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适欲同其欢,而乃遗其患,复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为四不可也。

《书》曰:“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损其实,崇其虚,驰不急之务,扰方春之业。前代圣主明王,忽于细微而成过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昼则欢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无益于圣朝。

上纳其言而止。

时侍御史任知古恃宪威,于朝行诟詈衣冠,挺之深让之,以为不敬,乃为台司所劾,左迁万州员外参军。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大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迁

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贡举事,稍迁给事中。时黄门侍郎杜暹、中书侍郎李元纁同列为相,不叶。暹与挺之善,元纁素重宋遥,引为中书舍人。及与起居舍人张叵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遥复与挺之好尚不同,遥言于元纁。元纁诘暹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国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恶,甚为不取也。”词色俱厉。元纁曰:“小人为谁?”挺之曰:“即宋遥也。”因出为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监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计会兵马,事隔数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挟敕,毛仲宠幸久,恐有变故,密奏之。寻迁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历皆严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侧息。

二十年,毛仲得罪赐死,玄宗思曩日之奏,擢为刑部侍郎,深见恩遇,改太府卿。与张九龄相善,九龄入相,用挺之为尚书左丞,知吏部选,陆景融知兵部选,皆为一时精选。时侍中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与九龄同在相位,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耀卿与九龄素善,林甫巧密,知九

龄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与。林甫引萧灵为户部侍郎,尝与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萧灵读之曰:“蒸尝伏腊。”灵早从官,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挺之戏问,灵对如初。挺之白九龄曰:“省中岂有‘伏腊侍郎。’”由是出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龄尝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谓之曰:“李尚书深承圣恩,足下宜一造门款狎。”挺之素负气,薄其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门,以此弥为林甫所嫉。及挺之嘱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诘于禁中,以此九龄罢相,挺之出为洺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绛郡太守。

天宝元年,玄宗尝谓林甫曰:“严挺之何在?此人亦堪进用。”林甫乃召其弟损之至门叙故,云“当授子员外郎”,因谓之曰:“圣人视贤兄极深,要须作一计,入城对见,当有大用。”令损之取绛郡一状,云:“有少风气,请入京就医。”林甫将状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风,且须授闲官就医。”玄宗叹叱久之。林甫奏授员外詹事,便令东京养疾。

·名句欣赏·

【君子以果行育德】——《儒林外史》

果行:踏实的行为。育德:培养厚德。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风:像风一样。草:像草一样。上:加。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怀:怀念。土:乡土。刑:法度。惠:对自己的恩惠。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礼记·檀弓上》

以:用。细人:指见识短浅或地位低微的人。姑息:无原则的宽容。

【女子无才便是德】——《家训钞》引明人陈眉公语。

日本记住原子弹，忘掉了“九一八”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警世钟上的四个大字“勿忘国耻”

2012年是“九一八”事变81周年。“九一八”事变后的这81年里，日本人是怎样看待那段历史的？随便问一个日本人，8月6日和8月9日是什么日子，他们准会告诉你：那是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的日子。但很多日本年轻人却根本就不知道“九一八”是什么日子。抗日战争在日本普遍被叫做“日中战争”，过去曾被称为“支那事变”、“日华事变”。对于自身的“被害”，日本牢牢记住，日本人从小学开始就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育：日本是唯一被发射原子弹的国家，日本人深受原子弹之害……

日本首次使用军犬部队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

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这次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军犬部队，但战果不佳。

此战中的军犬部队指挥官板仓繁大尉被称为“日本军犬之父”。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板仓大尉指挥军犬部队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其中最被寄予希望的是其从日本带来的三条军犬，分别名为“那智”，“金刚”和“玛丽”。然而，实战中军犬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东北兵工厂损失惨重

第七旅所辖的三个团中，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

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

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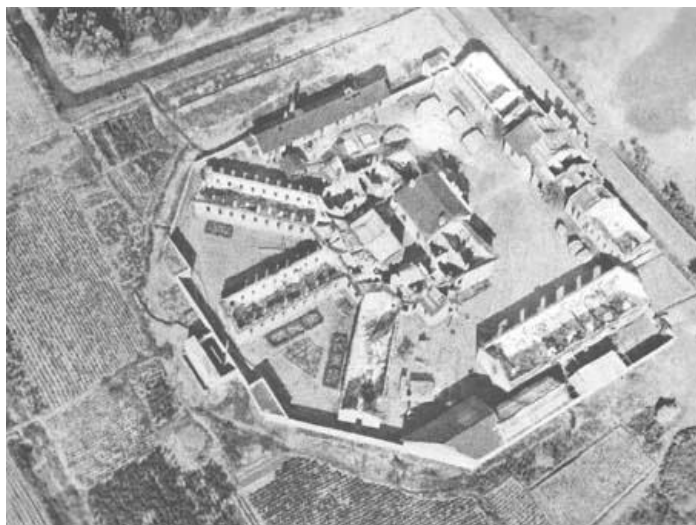
“步枪约 15 万支，子弹约 3 百万发，迫击炮约 6 百门，炮弹约 40 万发，山、野、重炮约 250 门，炮弹约 10 万发，火药约 40 万磅。”

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奉票和大洋，结果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

屈辱下的奋起还击

整个沈阳北大营驻军中，只有 620 团最终开始了反击。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后冲出北大营。

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己方阵亡一名连长。



战斗后的北大营。（《一亿人的昭和史 满洲事变》）

抗日战争后的 1948 年 4 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我们可会轻易丢了北大营？

从篡改历史到承认“侵略”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战争，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每年的 8 月 6 日和 9 日，广岛和长崎都要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纪念在原子弹爆炸中死难的日本人。每次在追悼仪式上，人们点上和平之灯，中小学生合唱歌曲，大家为牺牲者默祷，态度很虔诚，场面庄严肃穆。

日本有众多以原子弹爆炸为故事背景的影视作品，都拍得相当感人，日本人把原子弹爆炸称为“被爆”，他们在“被”字上做足了文章，那种“被害”的悲伤甚至被营造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据日本的和平人士说，当年的广岛曾

●史料钩沉●

是日本的“军都”，1888年即明治二年，以凶猛作战著称的第5师团成立，总部就设立在广岛。

1945年以前，广岛的宇品港是输送侵华日军的重要出港口，绝大部分侵华日军都是在那里出港。广岛曾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城市，这也是其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原因之一。日本在南京进行大屠杀、731部队搞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对重庆、成都等地实施无差别轰炸……这些都和广岛的悲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一切，如今的日本民众哪怕是广岛人、长崎人都知之甚少。

在日本，与战争有关的历史博物馆中，广岛原子弹资料馆比较著名。其中，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只有半句话。在“昭和时期的广岛”的展示牌中写到：“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以1931年的‘满洲事变’为‘引子’，随后1937年扩大到全面战争。”在这里，“满洲事变”被简写成两个字“引子”，至于谁先“引”的，以及战争的本质、内容，完全没有涉及。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方面在曾出版的大量文献中均将其描写为中国军队有预谋的策划。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932年发行的《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写真大全集》，在这本描述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照片图册中，日方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中国东北军部队对柳条湖段南满铁路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攻击”，目的在于破坏日本控制的这条铁路。日方宣传中将矛头直接指向一贯坚持抗日态度的东北军边防第

7旅旅长王以哲将军，并展示了王以哲将军教育部下警惕日军的训词——“看哪，营垣西边的铁道”，将其作为“中国军队预谋爆破柳奈湖铁路”的“证据”。

这些歪曲性的宣传，令普通日本人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关东军是受到中国军队挑衅才进行还击，从而引发“九一八”事变的。

然而，战争结束之后，随着档案材料的浮出水面乃至当事人的供述披露，这认识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日本权威文献普遍承认了关东军阴谋策划了这一事变的事实。在1978年编写的《一亿人的昭和史：满洲事变》中，不但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谋略”，而且在作家杉森久英所写的评论《石原莞尔的哲学》中，明确指出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正是当时在关东军手握重权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他们的目的是借此以武力攻占“满洲”，并以此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争霸亚洲。杉森写道：“作为事变契机的铁道爆破事件，实际是关东军策划的一起阴谋，这些事情，如今已经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



日本军犬学校中纪念死于北大营之战的日本军犬的纪念碑。（《板仓大尉忠勇记》新光社1932）

开国大典城楼上为何少了五元帅



1949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身旁的党政要人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张澜等都参加了。

但朱德总司令讲话时,军队领导中却缺少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照片看,十大元帅(尽管是开国大典后 6 年才有的,但证实了他们是军队泰斗)中,除去朱老总,还有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那么另外 5 位呢?

军队中仅次于朱老总的彭德怀,开国大典前作为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在收复延安后,又接替身患重病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接着挥师西北,解放西安、拿下兰州,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彭总在司令部临时设的兰州“三爱堂”大院里,从收音机里分享了他们几十年为之奋斗理想实现的喜悦。几天后彭总到酒泉,部署解放新疆的战役。

战功赫赫的林彪开国大典时才 42 岁,他正忙于部署衡阳、宝庆战役,由于中央需要四野派人参加首次政协会议,最有资格参加的林彪决定让罗荣桓政委代表参加。朱老总在开国大典上宣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时,林彪

正率领部队在隆隆炮声中摧枯拉朽地前进。

徐向前呢?解放战争的极度紧张与辛劳让这位体弱多病的指挥官病倒了,他不得不到青岛治病疗养,他在青岛用一个老式收音机听到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19 天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

还有聂荣臻虽然在北京,而且是北京市市长,他要安排开国大典的许多事宜,要多次登上天安门布置,要指挥阅兵预演。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正站在金水桥畔迎候朱总司令检阅,所以也没有在天安门城楼。

照片中还缺少一位军方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他虽然是解放后第一任北京市市长,但在开国大典前一个多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和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是在赣州听广播的,据当事人回忆,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叶剑英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收音机。

军人以战争胜利为己任,一切荣誉、欢呼都要让位于率军队继续前行。军人最辛苦,当胜利之时,他们还在激烈战斗中废寝忘食。

5 位元帅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不朽的功勋,虽然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上,但浓重地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斩贪官诛污吏

——铁腕反腐朱元璋

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因战功卓著而连续升迁,后成为推翻元朝的一支主力军。战必取、攻必克,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朝。明洪武元年(1368年),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称帝后,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民族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朱元璋认为:创业难,守业更难。明朝建立之初,经过战乱的洗礼,国家千疮百孔,急需休养生息。但朱元璋为了强化皇权,以惩治贪赃枉法为开端,对吏治进行了由上而下的严厉整顿。为了巩固业已建立的大明王朝,他特别强调的是,要想稳定新的统治秩序,必须重视整顿吏治。早在创业时期,他就叫参预机要的李善长研究历朝的法典,后来李善长依据《唐律》删繁就简地拟定出了切实可行的《大明律》。明太祖朱元璋以《大明律》为依据,做到有罪必罚,不徇私情。哪怕是皇亲国戚,只要犯法,一律治罪。对于其他功臣和官吏,他也是明令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案情严重者,格杀勿论。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殿面谕群臣,要赏功惩过。现举例说明。

第一、杀皇亲不念私情。明太祖姐姐的儿子李文忠被收为义子并改姓朱,打天下时,其义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进而被封为曹国公,官至大都督,兼领国子监事。由于他亲近儒生,又违法乱纪,屡遭杖责,后竟被毒死。

第二、诛国戚不念亲情。就是他的女婿、驸马欧阳伦,平时骄横,在借出差办公时又私贩茶叶,因而也被依法处死。

第三、斩功臣不念旧情。开国元勋汤和,本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同乡,又一同起兵。汤和在统兵取浙东、福建、四川和守备西北时屡有战功,但在封爵时却只封侯不封公,究其原因就是他“嗜酒妄杀,不由法度”。后在御倭斗争中又建战功,死后才追封为东瓯王。洪武十八年(1385),户部侍郎郭桓等滥用职权,吞没税粮百万石,案情泄露后,郭桓等数百名官吏均被处以死刑,其他因株连而下狱者达数万人之多。这也是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对贪官污吏的集中清洗。

此外,还有几个大案要案都逐一进行了严厉的惩治。诸如。户部尚书赵勉夫妇贪污,事发后夫妻二人同时被杀。工部侍郎韩铎上任不到半年,伙同本部官员先后卖放工匠,克扣工匠伙食费,盗卖芦柴,盗卖木炭,得来赃款三万余贯,全部私分。事发被杀。大名府开州通判刘汝霖,代犯人藏匿赃款,挥霍部分逼令各乡村百姓代为赔纳,被判梟首;凤阳临淮

直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母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容安等收逃兵贿赂,使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吏尽行典型(谓旧法,常规。);福建东流江口河伯所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鱼课一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敛财数万,被杀身死;进士张子恭、王朴奉命到昆山查水灾接受昆山教谕漆居恭、酋径巡检姚诚宴请,收受缎匹、衣服等物及钞币一千三百贯,将他们的二万二千六百亩已成熟田地谎报为受灾农田,勒令自尽。

为了整顿吏治,严惩贪赃受贿的官员和恫吓广大百姓,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1385)发布《大诰》,随后又在第二年发布《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这三册书共收集了一百多个营私舞弊等不法行为案例,并将它印发全国,要求每户一册,达到“居民熟识为戒”,以做到知法守法。因此,《大诰》的颁布,实际上是对全民进行了一次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就《大诰》的全部内容而言,有关百姓的犯法条目约占百分之九以上;有关豪强犯法条目约占百分之十八有余;涉及官吏犯法的条目竟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三本《大诰》充分体现了“治国先治吏”的主旨,主要意图也在于严肃纲纪、整顿吏治,要求朝廷和地方官员不得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使全国官民都能遵纪守法,各尽其职、各守其业。三本《大诰》对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诚然,《大诰》和《大明律》也存在着用刑严酷、网罗滥杀的弊端,再加上严密的监察体系和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的侦缉虐杀,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不

可终日。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腐败行为打击最严、手段最恨的当属平民出身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由于他自幼生长于贫苦之家,对元代官吏对待百姓的残酷了如指掌,也认识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是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认识到要保证他所建立起的政权不重蹈元代覆辙,就一定要肃清腐败分子,杜绝贪污腐败。他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虐,而庸鄙者次之。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是朱元璋出于集权专制的目的进行的,因而带有一定程度的残暴特征,打击面大,处死之多,因此有时也不免产生些先入为主的冤假错案,枉杀了许多无辜的官吏。可尽管如此,在无法解决制度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严酷手段整肃吏治、打击害群之马的斗争毕竟还是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这一系列严法严刑却也使得贪官污吏望而却步。经过长期的严刑诛杀,做官的人终于认清了朱元璋立场的坚决,认清了本朝的惩贪不殆,敢动真格的,世道已经变了,开始人人自危了,不敢肆意妄为,致使官场风气日趋清明。

朱元璋不细加斟酌、妄加屠杀的作风当然是不可取的,而且也只能归结于他的独裁、他的残暴,但他打击害群之马、整顿吏治的坚决态度,却有后人值得学习之处。

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生,是不知疲倦的一生。他所进行的整顿改革,固然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并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但应该肯定的是,他在位的31年中,吏治还是比较清明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的,经济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



中国当年是否应该出兵抗美援朝？

迄至 2013 年 7 月 27 日,朝鲜战争已停战整整 60 周年。60 年来,对抗美援朝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的说法。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当年究竟该不该抗美援朝?

中国出兵是受斯大林压迫, 是在为苏联打仗?

一种对抗美援朝的批评意见认为: 斯大林和金日成决定发动朝鲜战争时没有通知中国, 中国后来出兵主要是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和逼迫, 中国充当苏联的傀儡, 打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甚至“毛泽东本人也认为, 中国牵连进朝鲜战争绝对错了”。

毛泽东说的是“朝鲜战争”错了, 而非“抗美援朝”错了

不可否认, 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 确曾对米高扬说过类似这样意思的话: “斯大林、

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 最后, 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 这是错了, 绝对错了”、“这场战争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认为斯大林应该对此负有责任”。但若以毛泽东这些话为依据, 说“连毛泽东本人在 1957 年也认为, 中国卷入朝战, 绝对错了”, 进而否定抗美援朝, 却显然是一种曲解。毛的本意其实很明确: 斯大林和金日成撇开中国发动朝鲜战争是个错误, 这个错误迫使中国不得不抗美援朝, 给中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换言之, 毛泽东否定的是朝鲜战争, 而非抗美援朝; 错的是斯大林, 而非毛泽东——一个中逻辑不难理解: 若没有斯大林、金日成轻率发动朝战, 则第七舰队不会驶入台湾海峡, 联合国军也不会登陆朝鲜半岛, 中国将有可能完成统一, 而不必出兵朝鲜。

另外, 毛泽东事后对米高扬就朝战做出

的这一评价，也未必建立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之上。引发朝鲜战争的责任究竟在谁，自斯大林死后，一直是中苏两国高层持续争论的一个政治话题。1960年6月，赫鲁晓夫就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与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就该话题展开过激辩。赫鲁晓夫认为“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彭真则坚持：“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显然也是政治话题而非历史话题。事实上，赫鲁晓夫和彭真的观点各有依据：斯大林与金日成在拟定计划时确实把毛泽东排除在外；但毛泽东在1950年前后，也确实认为朝鲜的统

一问题，必须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当金日成奉斯大林之命向毛泽东通报其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斯大林并且表示“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并没有表示反对。

虽然需要考虑苏联因素，但中国最高领导层从未丧失自己的决策主动权

毛泽东说“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是否含有中国出兵主要是受了斯大林欺骗和压迫的意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事实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在出兵朝鲜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固然需要时时考虑苏联因素，但从未丧失自己的主动性。尽管朝战的爆发完全是平壤和莫斯科密谋的结果，北京被完全排斥在外，但在1950年7月2日，美军全面参战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表达对金日成的军事冒险的不满，并抱怨中方得不到公开报道之外的任何战争情报的同时，仍主动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派遣志愿军到朝鲜作战。在更早的5月15日，毛泽东曾提醒金日成要提防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但金

日成以斯大林曾告诉他帝国主义不会干涉为据，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毛泽东仍主动表示：“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



●史料钩沉●

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当时踌躇满志的金日成,表示感谢后谢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进入8月份,美军的参战阻止了北朝鲜的攻势,战场局势开始扭转。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明确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5日,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说:“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又致电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26日,周恩来在国防会议上又讲:必须要推迟进攻台湾,解放军的战略方向转到北方,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但此时,苏联和北朝鲜都尚未意识到战局已起了关键的变化,8月28日,斯大林仍在祝贺金日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相信“可耻的武装干涉者很快就会被赶出朝鲜”,金日成则在三天后回信,向“敬爱的导师致谢”。可见,在苏联和北朝鲜都尚未意识到需要中国参战的时候,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入朝作战做准备了。

直到9月30日,在北朝鲜军队全面溃败的现实面前,金日成才正式托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转呈求援信,表示北朝鲜“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期望苏联出兵朝鲜,救他于濒危之中。信中还说:如果苏联不愿意出兵,也请斯大林帮助请求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志愿军到朝鲜

作战。金日成不知道的是,苏共政治局也恰恰于当天作出决定,宁可坐视北朝鲜灭亡,也绝不出兵与美军作战。第二天,斯大林就应金日成的要求,给北京发出了求援的信和电报,把皮球踢给了中国。此后,斯大林固然相当希望中国能够参战,不放弃一切机会对中国做出参战决定施加影响,但其影响力,从未上升到决定性作用的高度。最典型的证据就是:10月13日,斯大林曾通知金日成,中国将不会参战,他最好立即着手疏散人员,并准备向中国和苏联边境撤退军队。斯大林之所以判断中国不会参战,是因为他刚刚表示不能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已开始考虑,北朝鲜沦陷后,中国东北应成为金日成流亡政权的庇护所。很显然,对斯大林而言,中国出兵朝鲜固然很好,若不能出兵,也并非不可接受。最终的决策主动权,仍握在中国最高领导层手里。

美国无意侵略中国,抗美援朝是高层误判了形势?

既然是否入朝参战的决策主动权始终握在中国最高领导层手里,也确有资料证实,美军在介入朝鲜战争时,并无意将战火燃烧到中国境内,基于这两个前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抗美援朝要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误判形势的过激反应,要么其真实目的本就不在于“保家卫国”,而是意识形态作祟。

美方的低级别“和平承诺”,很难对中方产生说服力

朝战爆发前,中国最高领导层确曾一度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并不紧迫,甚至认为即便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太可能直接军事干预。但朝战爆发后美方的过激反应,尤其是在6月底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并宣布



台湾地位未定，对中国最高领导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刺激——据李奇微回忆，美军将领听到朝战爆发的消息，“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定要与美国“一决雌雄”了；白宫同样认为，朝鲜战争“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必须予以反击，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但实际上，斯大林根本无意将战争扩大到朝鲜半岛之外，美方的反应实属过激。朝战之前，自1948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一直采取收缩方针，并拟放弃台湾；朝战爆发后，美国除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外，继而又向越南保大政权增加军事援助，并加强了在菲律宾的美军力量。这种前后变化，不能不让中国最高领导层为自身的国家安全感到忧虑，尤其是美军直接介入朝战后，中国实际上已同时在东北亚、台湾海峡和东南亚三个方向受到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这种压力的陡增，决不是一次低级别的“和平承诺”可以化解的。周恩来曾断定：“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以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显然，周恩来相当敏

感地注意到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行动，并将其视作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

出兵维系金日成政权在北朝鲜的存在， 是避免东北糜烂的唯一办法

但美方显然更愿意从中苏同盟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对朝战的态度。当战争进行到10月份，苏联无意直接介入朝鲜战争的立场已表现得很清晰时，中情局向白宫提交了他们的基本判断：“倘若苏联决定不去发动一场全球战争，虽然中共全面介入朝鲜的可能性继续存在，但是，这种行动在1950年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此期间，干涉将很可能只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提供秘密援助。”因此，杜鲁门仅仅将周恩来关于三八线的警告视作一种虚弱“讹诈”。美方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国最高领导层如何决策，并不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而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

确实，朝战前期美方一直努力控制着不要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但这种控制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看来毫无意义；真正具备实际战略价值的，是美军不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在三八线以北的存在，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

●史料钩沉●

供必要的缓冲；而一旦战事推进至鸭绿江，按照斯大林的计划，金日成将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其残余部队也将撤入东北休整，战火不进入中国境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将获得充足的理由派苏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正如沈志华所说：“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同时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更何况，麦克阿瑟当时还喊出了打过

鸭绿江的口号，美军飞机也确确实实轰炸了中国东北，尽管美方解释那只是“误炸”。美方似乎过于坚信中国与苏联利益的一致性，而没有意识到中方对国家安全的这种深刻担忧。究竟是任凭东北糜烂（即便美军不入侵，也会成为金日成流亡政权的“根据地”，而不再可能作为中国的工业化基地），决不出兵；还是出兵维系金日成政权在北朝鲜的存在，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必须作出的选择，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事实上，最高领导层也曾考虑过不出兵、增强东北防空力量和搬迁工厂的方案，但最终发现拟定的计划，就现有的财政力量根本不可能做到。故而，如牛军所述，“通过到北朝鲜作战使东北摆脱安全困局，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

意识形态因素固然有，但最关键的决策依据仍是国家安全利益



位于韩国京畿道坡州市积城面番谷的志愿军墓地。此处共长眠着 367 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冷战的意识形态因素究竟在抗美援朝决策中起到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对毛泽东而言，意识形态因素并不关键，关键在于战争能否达成让金日成政权在三八线以北继续存在的目标，从而避免中国东北的糜烂。只要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毛泽东可以放弃很多东西。譬如：

第五次战役结束前后，毛泽东曾主持中央会议讨论抗美援朝的“下一步怎么办”。据聂荣臻回忆，与会者多数同意争取在三八线附近停战，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理由有二：1、占领三八线以北，已经达成了出兵的政治目的；2、沿三八线停战各方都比较能够接受。稍后，毛泽东即向斯大林表示：中国不愿意作为主要角色参与停战谈判，“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必须由斯大林“密切地指导”，建议斯大林“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们就行了”，并请金日成经常与斯大林联络，“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

毛泽东为什么甘愿放弃在停战谈判中应有的地位，这种撒手不管的态度背后，是否隐藏着中、苏、朝三方的某种剧烈分歧，尚不得而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既然中国军队已经帮助北朝鲜将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左右，中国参战的基本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将剩下的问题甩给苏联和朝鲜，自己抽身而出（至少部分抽身），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显然，这种选择与意识形态并无多大关系。当然，斯大林不会上当，无论是战场还是谈判桌，苏联决不愿意直接介入朝鲜战争，故而明确回电毛泽东：由莫斯科领导谈判“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

判”，苏联“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斯大林的决策也和意识形态无关。另外，据苏联驻朝鲜使馆 1951 年 9 月发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与北朝鲜在停战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中方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拒绝进攻性战役”，“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朝鲜方面则担心“会被强加上破坏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威信的停战条件”。中、朝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因素，并不能使二者步伐趋于统一，反而引发猜疑，也可见至少在朝鲜领导层看来，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依据，并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

还有一点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有些批评意见认为，“不先解放台湾，而出兵朝鲜，结果台湾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确系最大错误”。这种意见，是犯了把“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混为一谈的老毛病，以致颠倒因果。志愿军出兵朝鲜是在 1950 年 10 月 19 日；美国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在 1950 年 6 月 27 日。说“朝鲜战争阻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可以的，说“抗美援朝阻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则大错特错。事实恰恰相反，美国 6 月份对台湾问题的强力干预，对中国 10 月份的抗美援朝决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不可否认，在抗美援朝的战争进程和谈判进程中，中方领导层的许多决策未必最优，有不少值得商榷反思之处，尤其是失去了一些很关键的达成停战的机会。但就“该不该抗美援朝”这个问题而言，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在决策过程中，既未沦为他国的傀儡，也未错判形势。



中国历史上的四个咸宁县

“咸宁”二字，最早见于儒家经典《尚书》和《易经》。

《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体现了上古贤君选贤任能、从谏如流的政治思想和关爱天下弱者的博大仁爱之心，一直被视为政治清明的象征。《易经》的《乾·彖》“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表现了古人希望贤明的君主出现而达到天下和谐的思想。在古汉语中，“邦”和“国”指的是地方、地域，以及王侯的封地；“咸宁”指的是“全都安宁”。无论是“万邦咸宁”，还是“万国咸宁”，都是古人美好的政治理想，而“咸宁”又因此成了一个美好的字眼，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政治场合。用作行政区域的命名，是其体现之一。

历史上以“咸宁”为县名的，总共有四地，其中最早以“咸宁”为县名的当数陕西。

据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所述：隋文帝杨坚统一宇内，在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废天下诸郡之后 15 年即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 年），更改了 140 多处县名，主要是改掉带有前代名字的县名（如晋兴、宋广、齐昌、梁乐、魏安、东燕之类）和重复县名。北周、西魏时分属

绛郡、延安郡的太平县，被改名为咸宁县，治所在今山西襄汾县西北陕西宜川县东南。这是“咸宁”作为县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唐初，改隋都大兴城为长安，仍辖大兴、长安两县。唐高祖武德元年改大兴县为万年县，仍由万年、长安两县分治长安城。高宗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在万年县的西部设明堂县，分长安县东南部设乾封县。武后长安三年（公元 703 年）万、长两县撤销。永昌元年（公元 689）分长安县南部设永昌县，又于神龙元年（公元 705）撤销。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 748 年）以“万国咸宁”意改万年县为咸宁县。53 年后又复名万年县、长安县，此后两县再次并存并以朱雀大街为界，万年县治东，长安县治西。历史上的第二个“咸宁”县名一度消失。北宋宣和七年（1125 年），改万年县为樊川县，金大定 21 年（1181 年）改樊川县为咸宁县。1913 年，民国政府在关中地区设立关中道，辖长安等 41 县。1914 年咸宁县撤销，并入长安县，结束了汉代以后一城由两县分管的局面。陕西咸宁县名前后断断续续存在了 798 年，至今只剩下了一条咸宁大道。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刘岩政权割据岭南时，乾亨元年（公元 917 年）改广州为兴王府，并仿唐代首都长安建置，分南海县为咸宁、常康（在兴王府附郭）二县及永丰、重合二场，以拱卫都城。咸宁县治所在今佛山市顺德区北窖镇简岸路村（一说为广州倚郭）。宋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潘美平南汉；五年，并咸宁、常康二县与永丰、重合二场及番禺、四会为南海县。广东咸宁县仅仅存在了 56 年。

湖北咸宁县最后出现。湖北咸宁之地有行政建置，始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 768 年）。当时，割江夏县南境金城、丰乐、宣化三乡置永安镇，这是咸宁建置之始；五代时吴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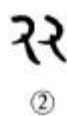
溥乾贞二年（公元 928 年）改永安镇为永安场。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 955 年），升永安场为永安县，隶属鄂州，此为咸宁立县之始；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为避宋太宗永安陵之讳，按《尚书》、《易经》中的“万邦咸宁”、“万国咸宁”与“永安”近义，改为咸宁县，此为鄂南以“咸宁”冠名之始，此后 1000 年，与陕西咸宁县并存了 743 年。隶属虽屡有变迁，而咸宁之名却未曾改易。1983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批准咸宁撤县立市，属省辖县级市，由咸宁地区代管。其间，1965 年 7 月咸宁专区成立，1968 年改称咸宁地区，1998 年撤地设市，鄂南之地尽称咸宁。

·解字·

“友”



①



②



③



④

这个“友人万里情”的“友”字是个会意字。甲骨文①是两只右手靠在一起，这就像现在的旧友重逢，二人都伸出右手，紧紧相握，表示友谊。金文②是两只粗壮的右手。③是小篆的形体，两只右手一上一下。可是到了楷书④，把小篆上部的一只右手变成了一只左手，这样书写方便，形体美观。

“友”字的本义就是“朋友”，如《荀子·性恶》：“择良友而友之。”这句话中的两个“友”字词性是不同的：前一个“友”字是名词，当“朋友”讲；后一个“友”字是动词，当“友好”讲。也就是说，要选择好的朋友和他友好。凡“友好”，大都互相亲近，因此，“友”字从“友好”之义又可以引申为“相亲近”，如：“瓚深与先主相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这里的“相友”也就是“相亲近”的意思。

在古书中常见“友于”一词，如《书经·君陈》：“友于兄弟。”这是指“兄弟相爱”的意思。另外，陶潜《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诗：“再喜见友于。”若把这句诗中的“友于”理解为“兄弟相爱”那就错了。这里的“友于”是“兄弟”的代称，当然也是从“兄弟相爱”之义引申出来的。所谓“再喜见友于”，也就是说：更为高兴的是又见到兄弟们。

在上古，“朋”和“友”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同门曰朋”，即师从同一个老师的人称为“朋”；“同志曰友”，也就是说“志同道合之人”称为“友”。



冯玉祥 三到韩森寨

冯玉祥将军曾先后三次来过韩森寨,成为村民喜谈乐道的历史话题。

第一次,1914年(民国三年)五月间,将军年方三十二岁,任警卫军左翼第一旅旅长兼一团团长,随北洋军政府任命的“剿匪”督办陆建章,经河南入陕,将军兵行临潼暂驻,省长宋联奎亲往临潼迎接,将军很受感动,再三致谢,交谈之下,相互倾慕。随口即问到西安的驻地,宋答以“小雁塔寺,一切已准备好了,敬请光临。”下午三时将军率全军出发西进,行至灞桥附近,骤遇大雨。因这条大路早已破败不堪,天晴尚坎坷难行,遇雨更是泥深二、三尺,无法举步。行至韩森寨村,士兵都成了泥人。因考虑无战斗任务,临时决定,就地宿营。在薛家园子村外,搭起五十多个帐篷。官兵挤在一起。时天已临夜,但没有一个官兵进入村内。第二天雨仍未停。由军需官购来大批麦草,分给各连队,烤干士兵湿衣,支锅做饭。村民们因感到哪儿来的如此规矩的队伍。有些谙世的老者,自行前往观望,均被邀入帐篷内,穿着士兵军服的官长,咸来亲热地打招呼。领头的高大魁梧的青年军官,自我介绍:

“我叫冯玉祥。”和大家一一握手,外表的朴素,掩饰不住内在的热情。让座后,拉起了家常。问起村的庄稼收成,问民间的疾苦。谈到军阀混战,国难民灾,谈到孙中山革命的前景。并自言初次来陕,关于风土人情,乡规民俗,都很生疏,务请各位乡亲多加指教。言谈随和,情态诚挚,感人至深。

谈话中正值军队开饭时间到了。将军遂请大家一起就餐。推让再三,盛情难却。几盘咸菜,稀粥烙饼,官兵同样。也算是一次军民联餐。

这次冯将军给韩森寨村民留下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朴素大方,善于治兵,赢得了村民们从心底的爱戴和敬仰。他带的这支劲旅,也给村民留下了“义军”的美名。

第二次,是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随着皖系军阀的失败,凡属皖系的官儿都得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原是段祺瑞的学生,属于皖系,1921年被掌握中央的北洋军阀曹(錕)、吴(佩孚)撤职。但其受两面派省长刘镇华的拨弄,拥兵自重,抗不交待。中央派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率二十师、第七师、四混成旅和冯玉祥

的十六混成旅入陕,准备以武力接收。冯为左翼指挥官。在临潼击败姜宏谋,灞桥打垮姚震乾,一路旗开得胜。最后在韩森寨激战,逼陈军退入城内,遂架炮于韩森冢上,向城内轰击。数炮之后,城内送出信来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也出城迎接。

于当时设在村东帐篷内的司令部,冯将军接待了韩森寨村几位老人的慰劳。他高兴地说:“老熟人又见面了!玉祥应该来看望各位老朋友了,不料反劳驾前来慰问,实在不敢当,受之有愧啊!”“冯将军赶走陈树藩老贼,为陕人除一大害功在三秦。”这时老人中的钱相约说着并举双手报拳。“食民之禄,理应为民除害,何功之有?各位老朋友太过奖了。”电话铃响了,大家看到将军很忙,即告辞起身。临行将军约定次日分别看望各位。但晚上接到命令,连夜西进、追剿陈军。等到天明,帐篷早已无踪。地扫得干干净净,夜间唯听到集合号声,其余鸦雀无声。时值1921年5月下旬。

第三次,督军阎相文因受省长刘镇华的刁难作弄,三师一旅的军饷无法筹措,曹(锟)、吴(佩孚)派来的八百附员无法安插,整天吵着要官要钱。加之杀了胡作非为、纵兵殃民的郭坚,受到北洋政府的严责,一气之下,于8月23日夜半,服毒自杀,25日冯升任督军。他坚持兴利除弊的施政方针,1922年春上,亲自率部队,修筑潼关到西安的大路,顺便到韩森冢植树,他和士兵一起担水浇树。村民们都上坡去观望。他正挑着水担上坡,远远地望见和他曾经接触过两、次的钱相约老态龙钟地走上坡来了,马上丢下担子,紧上前几步,搀扶住相约。笑容可掬,和气而亲切地说:“您老也来了,一向身体可好?”钱相约也兴奋

的说:“将军忙于军国大事,操心劳形,日理万机,尚认得老朽,”“韩森寨是我的乡旧故土,这里有很多像您老一样的老朋友,岂敢忘怀。”村民们看到这种情况,都围上来问长问短。将军就顺势将大家召集到坡上,因陋就简地讲了下面一段话:“父老兄弟们,借这个机会,有幸和大家见面,祝大家身体好!革命就是搭救老百姓。革命的队伍就是要保护老百姓的。这个道理我已经向全军讲了好多遍,告诫他们努力做好。但是我们的队伍是刚刚经过改编的,有几部分地方部队参加进来了,这中间难免有些没有训练好的少数军队,杂在里面。他们不明白革命,不懂得救国道理,可能对老百姓有扰害的事情发生,这是我非常忧虑的,今后如果确实发生骚扰的事情,请你们立即告诉我,我就经常住在新城内。一经查实,我就要惩治他们,不管他们是谁,绝不宽容。”

“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从大的方面讲,国难当头,列强对我虎视眈眈,尤其是小日本的二十一条条件,像二十一条毒蛇,缠挠着我们。我们陕西的情况也很复杂,陕北、汉南都还盘踞着军阀部队,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老百姓所受的种种痛苦至今尚未解除。这一切都使我枕席难安。本打算为大家多做些有益的事情,无奈有许多阻碍,尤其是财政的困难。只能作些兴学、修路、种树这些小事情,这些怎能解除你们多年来所受的绝大痛苦呢?我心里委实难过,十分惭愧,恳请原谅。敬祝大家早日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听讲者无不受感动,有些人竟淌下了热泪。讲话毕,将军一直扶钱相约下了坡,又挑起水担,浇树去了。从此,将军再无暇造访韩森寨。

(选自《西安村落记忆》资料)



西安城门趣闻(二)——永宁门

(西安城南城门,位于南大街南口)

1.永宁门沿用隋唐皇城安上门

西安南城门永宁门是在隋唐长安皇城安上门基础上改筑而成的。安上门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六月至三年(583年)三月,为皇城南面偏东门。唐至德三年(758年)正月,改称先天门,不久复其原称。唐末天祐元年(904年),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先后关闭了皇城南面朱雀门与含光门,遂以此门为南墙唯一门,历五代宋金元时期。明洪武七年至十一年(1374-1378),以皇城为基础拓筑再建西安城时,仍沿用此门为南城门,但改门名为永宁门,并改唐过梁式三门洞为砖砌拱券形单门洞,城门楼亦按西安四城门正楼二层三重檐歇山式绕一规制与明代建筑风格进行了改建。

2.永宁门外唐房玄龄宅

房玄龄(578-648),唐初名相。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博览经史,工书善文。隋开皇进士,累补隰城尉。唐兵入关中,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屡从出征,参谋帷幄,草拟文书,广收人才,助成统一。武

德九年(626年),参与策划玄武门之变,擢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进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前后为相二十余年,尽心奉国,太宗比为左右手,时称贤相。居住在长安务本坊南街之北,宅址约在今永宁门外东侧体育馆路中段。

3.南门瓮城关帝庙

明清西安城南门瓮城建制独特,瓮城墙不开正南门洞,只开东西两侧偏门洞,而在瓮城南墙前正对内城门洞处建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背南向北,庙中奉祀着关羽的坐神像。在关羽神像的两侧,各立有一尊神像,左边是关羽的儿子关平,右边是手持关羽青龙偃月刀的关羽部将周仓。庙前立有照壁,两侧竖有高大的铁旗杆,旗杆顶端插铁斗及三角形小铁旗。当时进出南城门,都要从瓮城这座关帝庙前经过。

关羽,字云长,生前为三国蜀汉大将,曾被曹操封为汉寿亭侯。关羽死后,后人念其忠义立为祠庙,初称关羽庙,或尊之为关公庙。

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简称“西安阎良航空基地”）是国家发改委 2004 年 8 月批复设立，2005 年 3 月正式启动建设的国内首家国家级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2006 年 11 月，航空基地被首批认定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2007 年 10 月，《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十一五’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2010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西安阎良航空基地升级为国家级陕西航空经济技术开发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成为全国唯一以航空为特色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驻有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一航飞行试验研究院、中航一集团第一设计研究院、623 飞机结构强度研究中心、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家航空企业和科研、教学单位，是亚洲地区最大的集飞机研究设计、生产制造、强度检测、试飞鉴定、航空教学五位一体的“航空城”。拥有 4 平方公里的亚洲一流机场，全国惟一的航空科技

专业孵化器，以及西飞公司国家级技术中心等全国最先进的飞机试验、实验中心。此外，区内还有 100 多个航空制造研究分支机构。“轰六”、“运七”、“飞豹”、“新舟 60”、“新舟 600”、预警机等 30 多种军民型号飞机在这里研制生产。被誉为“中国航空城”，还有人把阎良称为“中国的西雅图”。

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阎良飞机城的发展，1966 年 8 月 1 日以来，邓小平、李先念、李富春、江泽民、刘华清、乔石、李鹏、李瑞环、李岚清、胡锦涛、温家宝等先后视察阎良，检查指导工作。



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封关羽为壮缪武安王，时关羽庙称关王庙。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关羽晋爵为帝，称关帝庙，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子文庙并祀。清顺治(1644—1661)初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美圣大帝。此后，乾隆中加封“灵佑”二字，嘉庆十九年(1814 年)加封“仁勇”二字，道光八年(1828 年)加封“威显”二字，咸丰二年(1852 年)加封“护国”二字，继又加封“保民”二字，六年(1856 年)加封“精诚”二字，七年加封“绥靖”二字，同治九年

(1870 年)加封“翊赞”二字。至此，关羽谥号全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咸丰皇帝御书庙匾为“万世人极”。春秋仲月祀以太牢，制视文庙。明清时期武庙或关帝庙遍置各府州县厅，仅西安摩城武庙多至二十三处。长期以来，关羽作为忠义勇武形象的化身，被视为“护国保民”的守护神。西安南门瓮城特立关帝庙，反映了人们祈求关帝神护国保民灵佑一方平安的期望。南门瓮城内的关帝庙，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

大白杨社火芯子



富小云整理

大白杨社火芯子艺术造型巧妙、阵势宏大,在游演时,有多人共抬的“抬芯子”、还有马拉车载的“车拉芯子”,现已发展成由汽车装载的巨型芯子。大白杨村的芯子过去按“桌”计算,每次要扎制 10—15 桌,最多时达 20

桌,并且一直沿袭着一村分二社“分朋赛乐”的表演形式(形似两军对阵),明显带有盛唐时期演艺形式的烙印。大白杨社火芯子艺术以“奇、特、妙、绝”的表演形式著称,大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戏剧情节等,有的借古讽今,有的针砭时弊等等,颇受百姓喜爱,令人叹为观止。

大白杨社火芯子组织发起,历来设有专门民间组织机构,设有会长、副会长、委员、会计、出纳等,根据需要分工非常细致,设有芯子组、大衣组、绑扎组、化妆组、插芯子组、打拐子组、仪仗队、锣鼓队、车管组等 20 多个职能小组,各司其事,同心协力。

大白杨社火历史悠久。据已故中华梨园学研究会会长李尤白先生考证,唐代梨园就建在今大白杨村。因此可以推断,大白杨社火在唐代就已经存在。在唐代,每年农历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不宵禁,民间在这三天自行组织大规模的庆典活动。而在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上元节)这一天,皇帝要与民同乐。在庆典活动中,盛行“分朋赛乐”,共同表演、

以较胜负。大白杨社火至今仍沿袭着这三日的庆典活动,一村分二社的表演风格,便是延用“分朋赛乐”的形式。

大白杨芯子艺术的表演活动,最能体现“龙人”的精神风貌。位于龙首塬上,村型为“龙形”的大白杨村,历代相传:“大白杨的社火是前紧后松,是一条龙的阵势。”社火队的阵容重点在头,铙子手排列在最前面,接着是仪仗队、锣鼓队、平台车,长长的芯子车队排在最后,列队数百米,总体队形构成“龙”行之时,其势在头,其力在尾的龙摆尾之势。

随着社火队缓缓向前,最前面的铙子交替鸣放,发出炸雷般的响声,使远处的观众闻声汇集于市,接着是彩旗飘扬的仪仗队及锣鼓队、平台车,等到又高又长的芯子车队到来时,前面的队伍已相距很远,只听其声,无法看到,给人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一车又一车造型各异、精巧玄妙的芯子,使观众感到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由于观众争相尾随在车旁车后,大白杨社火队和观众形成的人流融合在一起,活灵活现地体现出了龙人的精神风貌,芯子艺术的演出借此收到了强有力的艺术效果。

大白杨社火芯子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活动内容隐含着我国历史时期的多种文化现象。1911 年,为庆祝辛亥革命成功,陕西督军张凤翔曾调大白杨社火在菊花园公演,欢庆胜利。解放前,大白杨社火曾在西安多次义演,为西安的进步秦腔剧社和戏校募集资金。1956 年代表西安市参加“陕西省民间花火芯子会演”,受到芯子行家的好评。同年,参加首都“五一节”游演活动,受到习仲勋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设宴座谈。1959 年进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

1982 年和 1983 年,大白杨东、西两村联

古代的“开学典礼”

每年的9月1日，是各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

在中国古代，新生入学有开学仪式或“开学典礼”吗？

在中国古代，新生入学不仅有隆重的“开学仪式”，而且备受重视，“入学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古代的儿童一般四至七岁入私塾读书，称之为“开书”、“破学”或“破蒙”，根据《礼记》和《弟子规》而流传下来的“开学仪式”则历经千年未改。通常的“开学仪式”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等内容。

正衣冠

据《礼记》记载：“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因此，古代开学仪式的第一课即是“正衣冠”。古人认为：“先正衣冠，后明事理。”让学生注重自己的仪容整洁，是首先要上的第一课。入学时，新生要一一站立，由先生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然后，“衣冠整齐”地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刻后，才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

行拜师礼

步入学堂后，先要举行拜师礼。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是拜先生，三叩首。拜完先生，学生向先

生赠送六礼束脩。所谓六礼束脩，亦即古代行拜师礼时弟子赠与师父的六种礼物，分别是，芹菜：寓意为勤奋好学，业精于勤；莲子：莲子心苦，寓意苦心教育；红豆：寓意红运高照；红枣：寓意早早高中；桂圆：寓意功德圆满；干瘦肉条：以表达弟子心意。其中“束脩”二字，有人解释为十条干肉。据《礼记·少仪》记载：“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郑玄注：“束脩，十脰脯也。”束脩在春秋以前就存在了，《论语·述而》中已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净手净心

行过拜师礼后，学生要按先生的要求，将手放到水盆中“净手”。“净手”的洗法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洗手的寓意，在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希望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朱砂开智

朱砂开智也叫朱砂启智或朱砂点痣，是开学仪式中最后一道程序。具体做法是先生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眉心处点上一个像“痣”一样的红点。因为“痣”与“智”谐音，朱砂点痣，取的其实是“智”的意思，意为开启智慧，目明心亮，希望学生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

合在市内游演，其阵容达数里之长，轰动古城，西安地区约60万人观看表演。1991年和1996年曾两度代表未央区参演“西安古文化艺术节”。2008年10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第

七届民间艺术节暨“山花奖”展演活动，荣获银奖。2009年5月入选西安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年6月，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太学和国子监是古代的大学吗

太学和国子监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的大学。对于太学,《辞海》称,“其名始于西周”。《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立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为西汉太学建立之始。东汉太学大为发展,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两者同设,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也就是说,太学和国子监都只是“相当于”古代的大学。其实,国子监除了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学院”,还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太学则为古代的中央官学,太学和大学尽管只有“一点”之差,但就办学宗旨、教授内容、学员学制等方面而言,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中国古代大学可以说是从太学到国子监逐渐发展的,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汉武帝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汉武帝遂在京师长安首设太学,太学也是历史上第一座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隋炀帝时,太学改为国子监,但国子监内还同时设太学。唐、宋两代太

学与国子学并存,且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到元、明、清三代开始,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国子监既是国家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教育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

如今大学的概念是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提供教学以及研究条件并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高等专科学校、学院、综合性大学等,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学者的。但太学和国子监是古代封建政权培养精通儒家经典官吏的,学生毕业即可步入仕途,因而古代有“学而优则仕”之说。此外,所学课程也迥然有异。太学中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太学所关注的只是人文领域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他自然科学和医学等专业并未涉及。太学的学生被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东汉时还有“诸生”、“游士”,西晋时有“礼生”、“寄学”、“散生”、“弟子”等称呼;国子监的学生则都叫“监生”。明代监生分为四类,称作四监;清代分为十类,称为六贡四监。明清规定,只有贡生或荫生才有资格入监读书,所谓荫生即依靠父祖的官位而取得入监的官吏子弟,此种荫生亦称荫监。

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

上插一小红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并饮菊花酒

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插茱萸和簪菊花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

重阳节 有什么习俗





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各地过重阳节的风俗

除了以上较为普遍的习俗外,各地还有些独特的过节形式。

重阳节在陕北正式收割的季节,有首歌唱道:“九月里九重阳,收呀么收秋忙。谷子呀,糜子呀,上呀么上了场”。陕北过重阳在晚上,白天是一整天的收割、打场。晚上月上树梢,人们喜爱享用荞面熬羊肉,待吃过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爬上附近山头,点上火光,谈天说地,待鸡叫才回家。夜里登山,许多人都摘几把野菊花,回家插在女儿的头上,以之避邪。

在福建莆仙,人们沿袭旧俗,要蒸九层的重阳米果,我国古代就有重阳“食饵”之俗,“饵”即今之糕点、米果之类。宋代《玉烛宝典》云:“九日食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粘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清初莆仙诗人宋祖谦《闽酒曲》曰:“惊闻佳节近重阳,纤手携篮拾野香。玉杵捣成绿粉湿,明珠

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

颗颗唤郎尝”。近代以来,人们又把米果改制为一种很有特色的九重米果。将优质晚米用清水淘洗,浸泡2小时,捞出沥干,掺水磨成稀浆,加入明矾(用水溶解)搅拌,加红板糖(掺水熬成糖浓液),而后置于蒸笼于锅上,铺上洁净炊布,然后分九次,舀入米果浆,蒸若干时即熟出笼,米果面抹上花生油。此米果分九层重叠,可以揭开,切成菱角,四边层次分明,呈半透明体,食之甜软适口,又不粘牙,堪称重阳敬老的最佳礼饌。

一些地方的群众也有利用重阳登山的会,祭扫祖墓,纪念先人。莆仙人以重阳祭祖者比清明为多,故俗有以三月为小清明,重九为大清明之说。由于莆仙沿海,九月初九也是妈祖羽化升天的忌日,乡民多到湄洲妈祖庙或港里的天后祖祠、宫庙祭祀,求得保佑。

新中国成立后,重阳节的活动充实了新的内容。1989年,我国将重阳节定为老人节。每到这一日,各地都要组织老年人登山秋游,开阔视野,交流感情,锻炼身体,培养人们回归自然,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的高尚品德。



雍正：

让贪官后代做穷人



雍正当朝时，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狗很善于寻找自己逃跑的道路，一有空子就钻进去了，关起门来就可以让它无空可钻，无路可逃。

雍正是一个“打狗高手”，他治理贪官的时候，采用关门打狗手段，先让贪官无路可退，然后再算账，最后让贪官陷入死亡之地。满清到了他的手中，有了一句响当当的口号“雍正一朝无官不清”。

雍正的父皇康熙，缔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这令雍正忧心如焚。

雍正很清楚，父亲缔造了一个盛世，国家不可能没有钱，银子都到贪官污吏身上去了。那么，怎么治理这些贪官污吏呢？

雍正有一个特点，他对官场上的流习和积弊都一清二楚。他知道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为此，他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经过调研与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先堵退路，后算账。

针对贪官的第一招，雍正的对策是派钦

差大臣清理亏空。雍正知道，如果不派钦差大臣，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靠贪污犯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人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

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官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两种情况：要么是昏官，要么是庸官，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只有派出钦差大臣才能彻底查清贪官污吏的情况。钦差大臣直属朝廷，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直接归皇帝领导，一定会尽心尽力，何况他们还想靠查处贪官污吏来邀功请赏呢。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雍正还想了一招令人叫绝的办法，他让这些钦差大臣带着一批候补官员去清查，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招妙棋，也是一招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弥补，衙门的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不一样

了,后来上任的人是来查账的,自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可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

针对借钱粮充账第二招,雍正下令所借钱粮全部充公。贪官们应对检查的第二招是借钱粮来填补亏空。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的人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不但利息高,还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屡为贪官所用。

贪官们的这些伎俩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正在派出钦差大臣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下令,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就是官府的,为国家所有,所借钱粮别想收回去。这一来,谁都再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

针对第三招所花小费报销,雍正成立了“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这样一来,部院长官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贪官们应付检查的三种方法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认罪。将贪官们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之后。雍正便开始“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即查出

亏空后,勒令该官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

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就是皇亲国戚也要赔。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

这样一来,就有些还不起钱的官员,对此,雍正的办法是抄家。元年八月,雍正下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格搜查衙门,一面让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遇到了这种皇帝,贪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临潼区召开区志编纂工作座谈讨论会

为了完成区政府与市政府签订的修志工作目标责任书确定的工作任务,确保11月底按时报送临潼区志(1988~2010)复审稿,8月27日,区委副书记李晓明、副区长邹林召集财政局、旅游局、卫生局、教育局、经济贸易局、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商贸总公司、科技局、统计局、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人武部等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区志编辑部同志,在区委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临潼区志编纂工作座谈讨论会。

会议首先由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段永宏通报了第二轮修志工作情况,其次由参会单位领导和责任编辑围绕各单位修志工作进度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对全区修志工作的建议开展座谈讨论。最后,区人大副巡视员、副主编张东江,区人大巡视员、区志主编牛耀东,区委副书记李晓明先后讲话。

会议认为,全区二轮修志工作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作进度整体较快,已完成了半数志稿初稿的撰写任务,各位编辑和各承编单位都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但总的来说问题依然不少,困难仍然较大。目前各单位仍然存在志稿质量参差不齐,修志工作进度不一,资料缺块断线的问题。有些单位对修志工作认识不高,存在草率应付的心态,对一些职能交叉的部分,推诿扯皮;有的单位在人员配备上还不到位,没有认真梳理本

行业23年的工作发展过程。这些问题造成修志工作在个别环节上推进困难,影响如期报送复审稿任务,影响市政府对我区的考核。

区委副书记李晓明和副区长邹林要求各承编单位:一是要严格依法修志,确保任务完成。修志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是各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各区志承编单位要切实提高对修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改变修志是区志办、编辑部的事的错误认识,按照工作职责全力抓好部门志稿撰写和资料收集。二是各单位要把修志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把修志工作放在心上,拿在手中,强化领导责任。要加强与区志编辑部的对接,全力做好工作。近期要集中两周时间完成原始资料搜集、填写资料卡片、编写资料汇编工作,对进展缓慢的单位,区委、区政府将约谈主要领导。三是切实加强督办工作。区目标考评办会同区委督查室、政府督查科安排对修志工作进行专题督查。四是区财政局要对区地方志办加强经费保障,解决电脑等硬件配备不足的问题;各单位要明确固定人员,主要领导要把好材料关,对修志工作从人员、时间、经费等方面提供保障。五是区志办要全面了解修志工作进展情况,掌握问题症结,随时报送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秋季为何称作“金秋”

谈及“金秋”，人们一般以为是因为一片金色，因而叫金秋。其实不然，我国古代，把世间万物看成由金、木、水、火、土构成。木主管东方和春季，火主管南方与夏季，金主管西方与秋季，水主管北方与冬季。土主管中央，并扶助木、火、金、水。由此观之，“金秋”就是“秋天”之意。

把“金秋”理解为金黄色的秋天，实为主观的错误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五脏”，声有“五音”，色有“五色”，这些都与“五行”（金、木、水、火、土）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四



季也是如此。以五行中的“金”为例：“金”分别对应于“五色”中的“白”、“五脏”中的“肺”、“五音”中的“商”（商音凄厉，与秋天肃杀之气相应，故以商配秋，称为商秋），以及四季中的“秋”。所以“金”与“秋”的匹配对应其实是与“五行”有关，“金秋”中的“金”应为五行中的“金”，并非是“金色”的意思。

古人是怎么『管』法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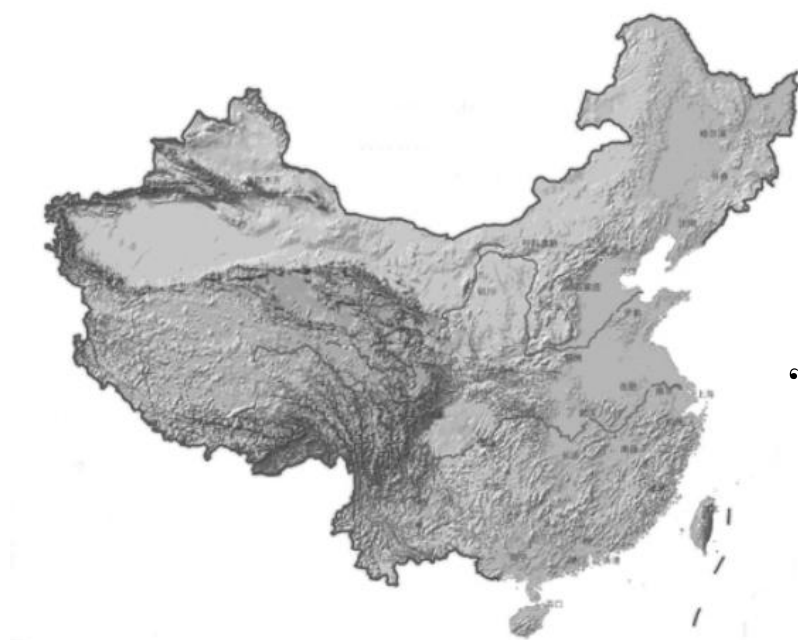


为了做到司法公正，古人很强调司法官的作用。古人所谓的治法，意在制定善法良法；所谓治人，在于培养执法的官吏。在治法已经具备的前提下，治人就是主导的方面，治法与治人不可偏废。

为使官吏明法知法，由唐迄宋设立明法科、刑法科选拔司法人才。明清二朝实行八股取士，为了弥补官吏法律知识的缺陷，律典特设“讲读律令”条，每年年底由

上司官考校，如果律意不明，用法有误，初犯罚俸，再犯刑责。这条规定依据国家形势的变动，时有兴废，但对于官吏学法确实起了督励的作用，由此而出现了《大清律例便览》之类的学律参考书。明清的官箴书中也多有熟读律令的内容。此项规定不见于外国的古代法典，是中华本土法文化的产物，颇有借鉴意义。

为使官吏严于执法，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晋朝，刘颂便发表了类似“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议论，至公元六世纪，《唐律疏议》规定“每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大清律例》规定：“每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答三十。”这项法律规定限制了司法官的恣意妄为、徇私舞弊，强调了司法官的责任，对于提高判案的准确性，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都有积极意义。中外法制史学者认为唐律以来的此项规定，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罪刑法定主义。



“中国”名称的由来

说法一：古代的“中国”，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国”的代名词。在我国的文献中，“中国”一词有六种含义：

1.指皇帝所在的都城。

2.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因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一般都处在各诸侯国的中间，所以叫“中国”。后来又发展为凡是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都叫“中国”。

3.指中原地区。

4.指国内、内地。清朝就把内地叫“中国”。

5.指诸夏族居住的地方。诸夏地区不仅居住着汉人，也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人们把这个地区叫“中国”。

6.指诸夏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从汉代起，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除了王朝之外，还应包括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部落。19世纪以来，“中国”则指我国的全部领土，与古代的不同。

“中国”一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很早很

早以前一个王朝——商朝。由于商朝的国都位于它的东、南、西、北各方诸侯之中，所以人们称这块土地为“中国”，即居住于中间的王国，它同时又是政治、经济中心。

在古代，“中国”没有作为正式的国名出现，因为那时的王朝或政权，只有国号，而没有国名。他们所说的“中国”，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

真正以“中国”做为正式国名简称，是从一场近代十分有名的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国”才成为具有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今天，“中国”已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组成的国家了，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说法二：“中国”这一名称始于周朝。但最初“中国”并不指国家，而是指国都。古代学者认为，帝王之所即为“中”，所建的城邑就是“中国”。至于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国”，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古人把神秘的天空看作神界，把星辰中

最引人注目的北极星看作“天中”，因为古人观察到满天的星星都围绕北极星转，就像一转动伞的伞一样，伞的顶端就是北极星。依此设想，人们便认定人君的国都是“土中”，即大地的中心。传说武王伐纣成功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考察四方，寻找“土中”，结果找到了伊、洛平原，定都洛阳，好让天下百姓像星星那样向自己围聚合拢，此地后来被称为中原、中州、中土。以后逐渐演变为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叫“中国”了。

说法三：中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古代文献记载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从古代的汉朝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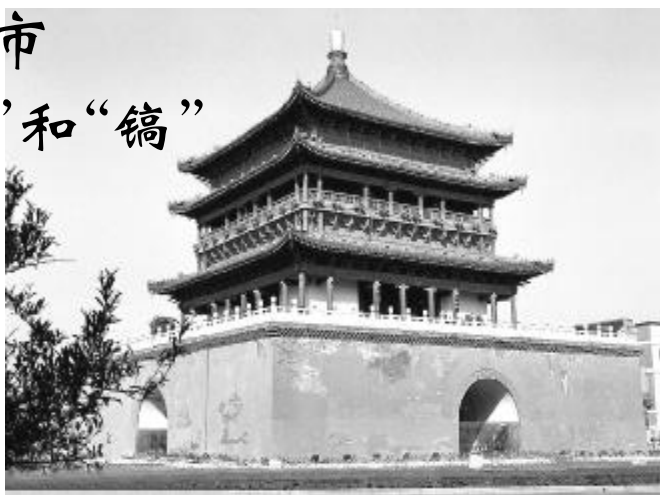
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各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1949年，“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北京。

西安作为都会城市 最早的两个称谓是“丰”和“镐”

公元前 1052 年，在周原（今陕西武功、彬县、岐山、扶风一带）迅速壮大起来的周人部族，在周文王姬昌的率领下，向西北和西南方用兵，征服了许多小国，沿渭水东进，伐灭了泂水流域的崇国，在现今的西安市长安区西南泂河以西建立了丰京，把政治经济中心从周原迁到丰京。迁都第二年文王去世，其子武王姬发又于数年之后的公元前 1046 年推翻了殷商王朝，建立了周朝，是为西周。武王又在泂河以东建立了镐京。《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



市”，即反映了镐京的建制概况。后经发掘证实长安区斗门街办花园村一带数公里内的宫殿遗址确为西周镐京遗址。当时丰镐并峙，同为西周国都，是西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东方最早的双子城。西安最早作为国都当是丰镐二京，距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



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和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

中国有许多城市,都曾做过古代国都,这其中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共有7个,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安阳、杭州即七大古都,七大古都中以西安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历史上在西安建都的有西周,包括此前的周国(276年);秦包括统一

前的秦国(178年);西汉(214年);新莽(15年);东汉献帝(6年);西晋愍帝(4年);前赵(11年);前秦(35年);后秦(32年);西魏(23年);北周(25年);隋(38年);唐(272年)计13个王朝,农民起义政权尚不计在内,建都时间在1100年以上,西安可谓人杰地灵得天独厚。

· 解字 ·

“双”

①

②

③

④

这是“比翼双飞”之“双”的繁体字“雙”。金文①的上部是嘴巴朝左的一对鸟(佳),其下是一只右手,可见这是一个会意字,是一只手捉住了两只鸟的意思,这就叫做“双”。②是小篆的形体,基本上同于金文。③是楷书的写法,与小篆的结构完全一致。④是简化字。

“双”字的本义就是“一对”,如“白璧一双”,就是“白璧一对”的意思由“一对”之义也可以引申为“偶”的意思,与“单”或“只”相对,如:“唐朝故事,只日视事,双日不坐。”(《宋史·礼志》)这几句话的大意是:过去唐朝的典章制度,单日坐堂办公,双日则不坐堂。凡“偶”就有比较的可能,所以“双”字又可以引申为“比较”或“匹敌”之义,如“其像无双”(宋玉《神女赋》)。也就是说:其相貌无人能与她匹敌(相比)。

“男左女右”的说法从何而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男左女右，好像约定俗成地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公共厕所，男左女右；戴婚戒，男左女右；另外，还有照结婚玉照，夫妻二人出席某些礼仪场合等等，男的往往在左边，女的往往在右边。如果颠倒了位置，就会有人笑话，说是违反了“男左女右”的习俗。

这种习俗是怎么产生的呢？据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盘古氏化仙之后，他的身体器官化为日月星辰、四极五岳、江河湖泊及万物生灵。这个传说虽然有神话的成分在内，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中华民族日神和月神的参考资料。

《五运历年记》认为：中华民族的日月二神是盘古氏双眼所化，日神是盘古氏的左眼所化；月神是盘古氏的右眼所化，民间流传的“男左女右”习俗，就是由此而来。那么中华民族的日月二神是谁呢？日神就是伏羲；月神即是女娲，均是传说中的上古之神。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出土于阿斯塔那的伏羲女娲图的白色浮雕和说明显示，吐鲁番的伏羲女娲图，出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交河故城附近的墓地也有少量发现，大多在夫妻合葬的墓穴中，一般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少数画则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

根据中国古代男左女右的礼俗，伏羲在左、左手执矩，女娲在右，右手执规，人首蛇身，蛇尾交缠；头上绘日，尾间绘月，周围绘满星辰。由于寓意深奥、构图奇特，富于艺术魅力和神秘色彩，自本世纪初发表以来，一直深

受学术界的重视。伏羲、女娲都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天神和人类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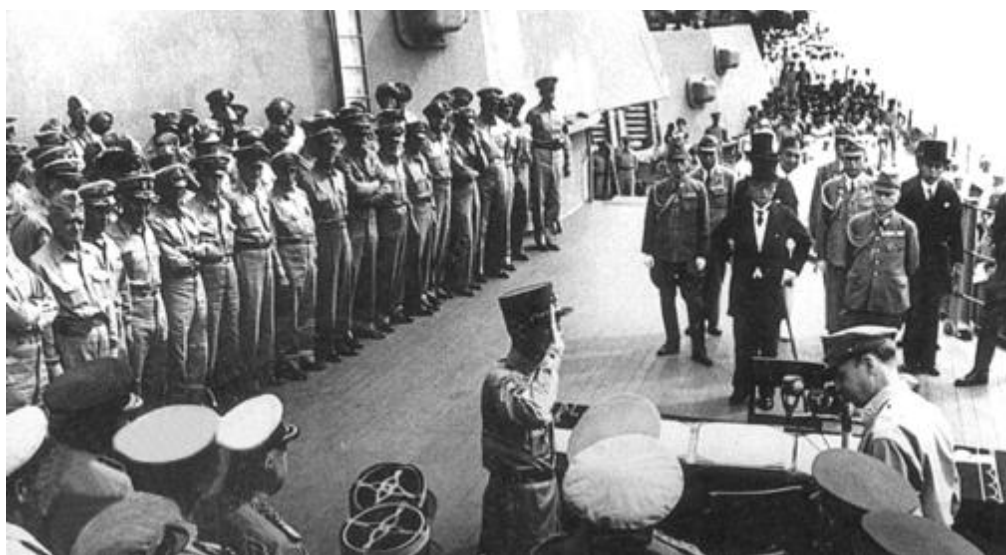
据说伏羲曾教导人们从事农、牧、渔业生产，女娲曾教导人们婚姻嫁娶的人伦礼法。他们手中拿的规和矩，即是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秩序的象征。

1953年，科学家发现，生物的一种基本遗传物体——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这一化生万物的基本遗传物质的结构——一种双螺旋线的结构形式，竟然与吐鲁番地区表现化生万物的人类始祖形象非常相似。以化生万物为名，吐鲁番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画像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杂志《国际社会科学》1983年试刊号的首页插图。

另外，“男左女右”的习俗还和古代人的哲学观关系非常紧密。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中通贯事物和人事的两个对立面就是阴阳。自然界的事物有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等。古人将其归类分为大、长、上、左为阳，小、短、下、右为阴。阳者刚强，阴者柔弱。

人的性格，男子性暴刚强属于阳于左，女子性温和属于阴于右。“男左女右”在中医应用上也有实际的科学意义，“男左女右”在医学上是表示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中医诊脉，男子取气分脉于左手，女子取血分脉于右手，即使小儿患病观察手纹也取“男左女右”的习惯。这就是“男左女右”的由来。这一沿袭至今的习俗，早在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当然至于“男左女右”是否真能表示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定在9月3日 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1945年9月2日，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视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这，是全世界发出的正义之声。

2013是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9月3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卢沟桥附近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在持续8年的抗战中，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战场，共消灭日军150万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5年8月14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21日，湘黔交界处的芷江城里，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前来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美军有关人员举行洽降会谈。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当时的国民政府于次日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1946年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曾将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布了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重新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了每年的9月3日。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0号《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中发布的有关抗日的纪念日有“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这是中国政府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抗日战争纪念日。



《卜算子·咏梅》

◎ (南宋)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作品赏析

这首《卜算子》以“咏梅”为题，咏物寓志，表达了自己孤高雅洁的志趣。这正和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濂溪先生（周敦颐）以莲花自喻一样，作者亦是以梅花自喻。陆游曾经称赞梅花“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梅花如此清幽绝俗，出于众花之上，可是“如今”竟开在郊野的驿站外面，破败不堪的“断桥”，自然是人迹罕至、寂寥荒寒、梅花也就倍受冷落了。从这一句可知它既不是官府中的梅，也不是名园中的梅，而是一株生长在荒僻郊外的“野梅”。它既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更谈不上会有人来欣

赏。随着四季的代谢，它默默地开了，又默默地凋落了。它孑然一身，四顾茫然——有谁肯一顾呢，它可是无主的梅呵。“寂寞开无主”一句，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客观景物之中，首句是景语，这句已是情语了。

日落黄昏，暮色朦胧，这孑然一身、无人过问的梅花，何以承受这凄凉呢？它只有“愁”——而且是“独自愁”，这与上句的“寂寞”相呼应。驿外断桥、暮色、黄昏，原本已寂寞愁苦不堪，但更添凄风冷雨，孤苦之情更深一层。“更著”这两个字力重千钧，前三句似将梅花困苦处境描写已至，其但二句“更著风和雨”似一记重锤将前面的“极限”打得崩溃。这种愁苦仿佛无人能承受，至此感情渲染已达高潮，然而尽管环境是如此冷峻，它还是“开”了。它，“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道源）；它，“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杨维桢）。上阕四句，只言梅花处境恶劣、于梅花

●历代诗人咏长安●

只作一“开”字，但是其倔强、顽强已不言自明。

上阕状物写景，描绘了风雨中独自绽放的梅花。梅花长在偏僻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它不是由人精心栽种的，它寂寞地开放着。“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在这样的暮色黄昏中，独自挺立开放的梅花难免会有着孤苦无依的愁苦，更何况环境如此恶劣，风雨交加，倍受摧残。这实在令人深深叹息。

下阕抒情，主要抒写梅花的两种美德。“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它的其一美德是朴实无华，不慕虚荣，不与百花争春，在寒冬就孤傲挺立开放，它的与世无争使它胸怀坦荡，一任群花自去嫉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它的其二美德是志节高尚，操守如故，就算沦落到化泥作尘的地步，还香气依旧。这几句词意味深长。作者作此词时，正因为力主对金用兵而受贬，因此他以“群芳”喻当时官场中卑下的小人，而以梅花自喻，表达了虽历尽艰辛，也不会趋炎附势，而只会坚守节操的决心。这首词以清新的情调写出了傲然不屈的梅花，暗喻了自己的坚贞不屈，笔致细腻，意味深隽，是咏梅词中的绝唱。

上阕集中写了梅花的困难处境，它的确还有“愁”。从艺术手法说，写愁时作者没有用诗人、词人们那套惯用的比喻手法，把愁写得像这像那，而是用环境、时光和自然现象来烘托。况周颐说：“词有

淡远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为高手。”（《蕙风词话》）就是说，作者描写这么多“景物”，是为了获得梅花的“神致”；“深于言情者，正在善于写景”（田同之《西圃词说》）。上阕四句可说是“情景双绘”。让读者从一系列景物中感受到作者的特定环境下的心绪——愁。也让读者逐渐踏入作者的心境。

下阕托梅寄志。梅花，它开得最早。“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齐己）；“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张谓）。是它迎来了春天。但它却“无意苦争春”。春天，百花怒放，争丽斗妍，而梅花却不去“苦争春”，凌寒先发，只有迎春报春的赤诚。“苦”者，抵死、拼命、尽力也。从侧面讽刺了群芳。梅花并非有意相争，即使“群芳”有“妒心”，那也是它们自己的事情，就“一任”它们去嫉妒吧。在词中，写物与写人，完全交织在一起了。草木无情，花开花落，是自然现象。其中却暗含着作者的不幸遭遇揭露了苟且偷安的那些人的无耻行径。说“争春”，是暗喻人事；“妒”，则非草木所能有。这两句表现出陆游性格孤高，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峻峻傲骨。

